

引 言

今山东淄博市地处鲁中南山地北缘，临近渤海，环境优美，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历史文化积淀深厚，齐国故都临淄城遗址便是其辖区内的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

周初姜太公就封于齐，兴建临淄城作为国都。为使“人民多归齐”，临淄城规模宏大，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中华第一大城”的桂冠。其利用区位优势“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使得临淄城的发展长期保持繁盛之势，成为海岱之间一大都会。战国时期，田氏代齐，对临淄城加以增扩，城内居民达七万户。至汉代，有刘氏齐王封此。西汉中期居民更达十万户，富庶程度甚至超过了皇帝之都长安。与此同时，临淄城的礼乐文化氛围亦十分浓厚。春秋时期，孔子来此与齐太师研讨音乐，聆听古老的《韶》音，大加赞赏。战国时期又设立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中心。汉代则儒风大盛。为赞颂临淄城，

汉末徐干及晋初左思先后作有《齐都赋》，北宋司马光亦曾作《稷下赋》等。

东晋以后 临淄城不再为都 先为郡治 后为属县，居民日减而城渐空，然却始终未被遗忘。自宋代起便不断有古物出土。李格非《过临淄绝句》诗云：“击鼓吹竽七百年 临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 曾得当时九府钱。”北宋宣和年间 有叔夷钟等春秋时期青铜礼器出土。至清康熙年间再出周代礼器，顾炎武曾为之作《齐祭器行》。而后 接连有汉画像石、战国印文陶器、秦汉印文封泥等出土。经考古工作者长期调查和发掘，齐国故都临淄城的初始风貌及演进之迹得以较为完整准确的揭示，现已成为展现中华文明演进历程的标志性遗迹之一。因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力，临淄故城先后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名城。在齐鲁大地上，临淄城永远是一颗耀眼的明珠。走近临淄故城，可领略其独有的气韵，更加深刻地解读齐鲁历史文化。

一 淄水营丘

齐国故都临淄城位于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东临淄水，西有营丘，古今地貌略同。

（一）淄水长流

临淄城址所在属山前河流冲积平原，海拔高度在 40 米至 50 米之间，地势南高北低，略有起伏，东北距莱州湾百余里。而据地质学研究，古时海岸线要较今日内缩。在距今 10000 ~ 5000 年前全新世海浸期，古临淄城所在地北距海岸约 25 公里。

城址西南距辛店（现为临淄区政府驻地）约 7 公里。辛店东南有牛山，海拔 174 米，为古临淄城南名山，左思《齐都赋》即言“牛岭镇其南”。其北坡有管仲墓，东侧有四王家（或称四豪冢），系田齐威王、宣王、湣（音 mǐn）王、襄王四代国君之墓。牛山之东有鼎足山，因三峰如鼎足而得名，山上有二王家，

传为齐桓公与齐景公之墓，经研究推定为田齐侯剡及桓侯午之墓。牛山西南有稷山，海拔 171 米，山上原建有后稷祠。此一带又有狃（náo）山，或作嶷山、巉山，今在青州市界。在临淄城址西约 10 公里有愚公山、土山、凤凰山等，下临河谷。

古淄水今称淄河，发源于今莱芜东北原山，沿今淄博市南部鲁山北麓流向东北，至牛山西侧汇入天齐渊，折向东流，再折向北，流经临淄城址东侧。在南北朝以前，淄水是汇入时水（今称乌河）后直接入海，至隋唐时期改行今小清河下游河道。至宋金之际，始汇入上中游河道，形成小清水系。淄水之名见于《尚书·禹贡》。相传大禹治水时，此水所流经地带土石呈黑色，水波若漆，故称淄水。其天齐渊在牛山西北、今辛店之东跨淄河铁路桥南约 250 米处，俗称温泉。古时五泉并出，形如腹脐，为祭祀天主（与地主、日主、月主等合称“八神”）之所，故称天齐（同脐）渊。齐国得名即缘于此。今泉址尚在，水已干涸。

乌河古称时水，发源于今辛店之西，北流经凤凰山及愚公山东侧，西北流经桓台县，在博兴湾头入小清河。今辛店西北有灋水流入乌河。临淄城址西侧有系水，北流至王青庄南分为二水，西折系水流入灋水；北流者称澠水，至广饶县境与西部康浪水汇合，再入小清河。

今齐都镇原存有元末重筑临淄县城，东、南、西、北城门上篆书石匾各题为“淄流斜抱”、“牛峰翠霭”、“愚岭遥盘”、“澠池襟带”恰道出了其四面如画的风光。

(二) 古营丘

古营丘位于今齐都镇西北，为此一带最令人瞩目的景观，因唐长庆年间曾立太公、桓公庙于其上，后世又称桓公台。

今所见桓公台略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 86 米、东西宽约 70 米，高约 14 米，东、北、西三面陡峭，南坡稍缓。而据北魏酈道元撰《水经注·淄水》所述：“今临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内，周回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迳其左，故有营丘之名，与《尔雅》相符。”则古时营丘似略呈圆形，依北魏铜尺一尺合今约 30.9 厘米推计，其周围三百步即一千八百尺合今约 556.2 米，高九丈即九十尺合今约 27.81 米，北部比南部降低一丈五尺即七十五尺合今约 23.175 米，远比今者高大。《尔雅·释丘》言：“水出其前而左，营丘。”晋代郭璞解说：“今齐之营丘，淄水过其南及东。”意在说明此营丘与其他丘陵所在地理环境各不相同。酈道元以及唐代孔颖达解说《诗经·齐谱》而言：“水所营绕，故曰营丘。”似理解

有误。今桓公台之南、东两面有淄河呈东折而又北折流势，与《尔雅》记载相合，有助于判定其为古之营丘；然相距较远，且淄河北折后未再西折及南折，故不可谓之“营绕”。据《说文解字》解释：“营，币居也。”而币（音 zhi 今多作匝）意谓环绕，则营丘当指其顶部呈四面高、中间低、略如围墙环绕状。因古时营与环音义相通，故“营丘”亦可作“环丘”。《后汉书·耿弇列传》载，东汉初年，建威大将军耿弇攻占临淄城，“升王宫坏台望之”。其“坏台”，当依《东观汉记》作“环台”即指营丘，因于其上作高台而称环台。

《诗经·齐风·还》言：“子之还兮，遭我乎狃之间兮。”《汉书·地理志下》引作：“子之营兮，遭我虬虺之间兮。”其还与营音义相通（亦有作嬖者）即指古营丘。此诗作于西周时期，营丘尚未被包围在城中。其南至狃山当有路相通，诗中之“子”自南而北去营丘，与“我”相逢于狃山之侧。登上营丘，临淄城内外风物可尽收眼底。

（三）爽鸠氏之墟

此一地区很早即得以开发。在临淄城址东南约 2500 米的淄河东岸后李官庄附近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其一期文化所属时代距今约 8000 年，已

发现红烧土面、灶坑、灰坑及墓葬，出土有陶器、蚌器、骨器、打制或磨制石器等；二期文化相当于北辛文化晚期，距今约 6000 年，已发现半地穴式居住址等。在后李官庄及前李官庄、淄河西岸大夫观村、崔家庄、东古城村等地发现有距今 6000 ~ 4600 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在临淄城址所在葛家庄、苏家庙及临近愚公山的田旺、桐林等地发现有距今 4600 ~ 4000 年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存。在田旺等地发现有距今 4000 ~ 3500 年的岳石文化遗存，已属夏代。在临淄城址以南尧王庄及城址以北双庙村等发现有商代遗存，其多见夹砂大口罐、素面甗、素面鬲、高圈足簋、折肩罐等东夷文化体系的器物，少见如厚胎宽边鬲、厚胎宽边甗等商式变体陶器。另在东古城村发现一座属商末周初的土坑竖穴墓，出土陶鬲、豆、罐各一件。其陶鬲素面无纹，为典型的东夷文化遗存。

据春秋时期齐相晏子追述，在太公就封齐国之前，先后有爽鸠氏、季荝、逢伯陵和薄姑氏等居此一带。其爽鸠氏为少昊氏属官。依照汉以来所传谱系，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颡顛、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少昊氏之世大致相当于龙山文化早中期，国都在今山东曲阜市境，属官均以鸟命名，如以五鸟掌天象历法、五鸠掌兵民诸事、五雉掌工事、九扈掌农事等，而分居各地。爽鸠即鹰鸟，为五鸠之一，主刑罚，所居之地旧无确指。在田旺村东北台地

上发现有古城址，城墙以夯土修筑，外侧陡立，内侧缓平，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其始建年代尚未查明，但不会晚于龙山文化中期。城内龙山文化堆积一般厚 2 米左右，最厚者达 3 米多。其下压有大汶口文化堆积层；其上有岳石文化时期城址，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城址内发现有大量夯土层，已清理出一批属龙山文化时期的大型灰坑和房基址等，出土有大量的陶器和石器。陶器有甗、鼎、盆、碗、杯、鬻、豆、罐等。其鼎、甗器足取鸟喙形，饰鸟冠图状；盆、杯和各类器盖多为黑陶，胎质细腻，薄壁光亮，制作精巧。最大的一件灰陶甗口径 44 厘米、高 116 厘米，为迄今各地所出的同类器物之冠；另外两件陶甗器形与之相近，大小递减。其盆形鼎亦是形态相同，大小有别。如此形成系列，当属礼器。以此城址为中心，在东西长 500 米、南北长 1000 米的范围内还发现有其他属同一时期的遗址多处，出土有许多陶器、石器。这些考古发现虽尚不能完全表明其非爽鸠氏之城莫属，但应该说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季荊所居亦无确指。《说文解字》解释：“荊，鸟喙也。”则当即后世所称即子(荊子)，为草名。其形状如乌鸦之口。由此推测，季荊很可能是一支以乌鸦命名的族系。其居此之时当属夏代，田旺城址上部所存岳石文化古城或即为其重筑。

逢伯陵为商代姜姓逢国之君。周人先祖古公亶父

娶逢君之女大姜为妃，生季历；季历生文王，为西伯；文王生武王，代商而得天下。其逢伯陵为大姜之侄，当大致与季历同时，值商末之世。周人缅怀大姜功德，而亦不忘逢伯陵。后世在今山东临朐县西逢山建有逢伯陵祠。古逢国当即在此一带，北距临淄城址百余里。

薄姑氏所居所世称薄姑城，在今山东博兴县柳桥镇，东南距临淄城址 25 公里。其少昊氏属官中有祝鸠氏，亦为五鸠之一，主民事。祝鸠即鹜，亦称勃姑，古音与薄（或作蒲）姑相通。由此推之，此薄姑氏很可能与祝鸠氏属同一族系，以鸟命名，为此一带原存古国，相沿至商末。周武王克商，薄姑君臣服，与太公所立齐国并存。至周成王时，薄姑氏等作乱，周公东征而平之，成王即以薄姑氏属地加封于太公。西周晚期，齐胡公曾迁都于薄姑城。后齐献公即位，又迁回临淄城。薄姑城内建有遯（音 chuān）台，晏子追述古事即在此台上。

自远古至商代，此一地区一直呈现连续发展之势，为周初太公立国建都奠定了基础。

二 西周齐都

太公吕尚出于姜姓，因先祖就封于吕（今河南南阳附近）而得为吕姓，其后裔辗转流迁至东海之滨。今山东日照市境原有东吕乡东吕里，相传即为太公出生地。时值商末，太公西行而得遇周文王，辅佐文王、武王父子，在周人克商的过程中多为谋略，立有大功。武王分封，以太公为首，于是得立齐国而有临淄城的兴建。

（一）太公筑城

今日漫步齐都镇周围，古临淄城遗址随处可见。在淄河之畔可找到大城东南角和东北城角以及部分东垣、南垣残迹，其与东南城角相连的南垣东段长达数百米；在桓公台以北可到小城北垣与大城西垣南端相接处，其部分地段夯土墙残高达 5 米。这些残垣断壁仿佛是刻意的雕塑，引人沉思浮想，缅怀曾经发生在

这里的故事，而最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公筑城这第一幕。

古临淄城历经沧桑，除少部分夯土墙残存于地面之上外；大部分地段地面上已不见城垣遗迹，然地下墙基夯土犹存。据考古勘测资料可知，其由大、小二城组成（见图 1）大城东垣从东古城以东的东北城角起，沿淄河西岸南下，多有折曲，走向基本正南，全长约 5209 米，基宽 20~26 米，而苏家庙村东一段墙基达 30~33 米。在城垣北段河崖头村东南的断沟处沟底发现一些大块自然石，应为城门遗迹，北部贯通东西的大道正朝此一方向延伸。在城垣中段葛家庄东南断沟北侧的城墙上发现以自然石垒砌的石墙，在城垣南段蒋王庄东北的拐角上发现一座夯土台遗迹。大城北垣全长约 3316 米，中段及东段平直，走向略偏西北；西段因系水回绕，在西古城西北处南折，而后又西折，亦平直。其基宽，西段及中段为 33~43 米，东段为 25~34 米。在西距西北城角 579 米处发现一座城门，门道宽 13 米余，长 23 米，称北垣西门。在东距东北城角 899 米处发现有北垣东门，门道宽 17 米，长 34 米。其形制特殊，门道两侧的城墙不对称，西侧城墙靠北，东侧城墙靠南，二者不在一直线上。为使门壁对称，西侧城墙向南加筑一段，形成 冂 状。另在西古城西北发现有北垣中门。在西段和东段各发现排水道口一处，分别宽约 15 米、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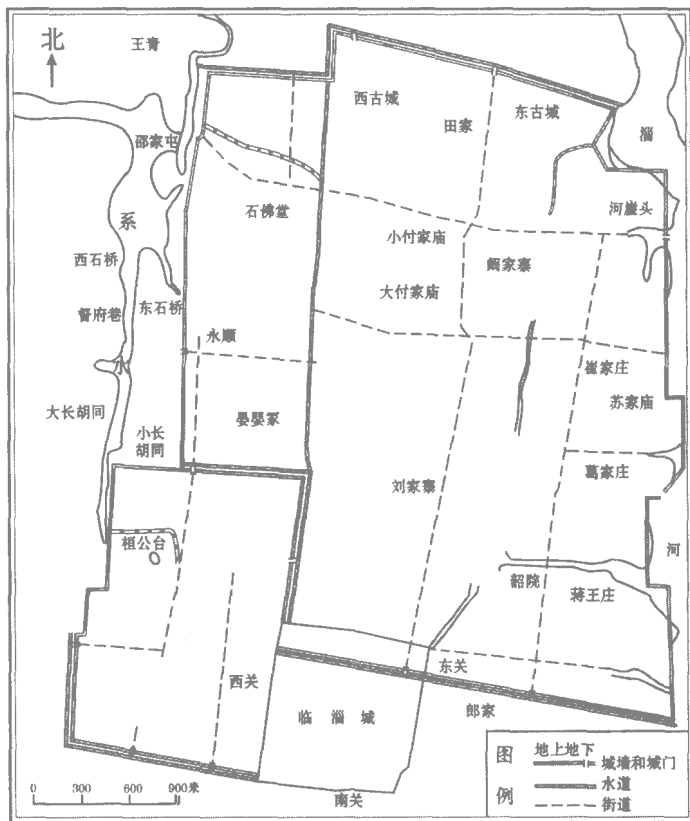


图 1 临淄齐国故城钻探实测图

(据《文物》1972年第5期附图改绘)

米，用未经修整的大石块堆砌。城垣外有护城河，东通淄河，西接系水，河道宽 25~30 米，中部深 3 米以上。大城西垣外临系水，自西北城角至南段与小城北垣相接处长 2812 米，基宽 32~43 米，略有折曲，

走向基本正南。在南距小城北垣 783 米处发现一座城门，门道宽 11 米余，长约 25 米。在靠近西北城角处发现一处排水道口，宽 11~17 米，呈内窄外宽的喇叭口形，亦用大石块堆砌。大城南垣自东南城角至西段与小城东垣相接处长 2821 米，呈直线，走向略偏于西北。其基宽 17~23 米，个别地段宽 25 米。在西距小城东垣约 890 米处发现一座城门，门道宽 13 米，长 23 米，其里外口较为整齐，呈方角，不同于已发现的其他几座城门的门道。另在东距东南城角约 1020 米处发现有南垣东门，门道宽 11 米余，长 19 米。城垣外有护城河，东与淄河相通，宽 25~30 米，中部深 3 米以上。城内发现有东部南北向大道、中部南北向大道、北垣西门大道、北部东西向大道、中部东西向大道、葛家庄北东西向大道、西垣城门大道等七条干道，其路土下皆为生土。探明排水河道三条，即西部二号、三号河道和东部四号河道，其通过排水道口连接城外护城河及淄河、系水。发现西周、春秋、战国及汉代居住址、手工作坊址和墓葬多处。小城位于大城西南部，周长约 7275 米，其东垣长约 2195 米，呈直线，北段墙基宽 38 米，南段 1000 余米全部为元末重筑的临淄县城西垣所压。在北距东北城角约 600 米处发现一座城门，门道宽 14 米，长 40 米，路面发现有石块，门道外口两侧城墙向前凸出，城外护城河亦随之折曲。南垣长约 1402 米，亦呈直

线，略偏于西北，中部墙基宽 28 米。发现城门两座，其东门东距东南城角约 330 米，门道宽 8.2 米，长 42 米，连以南北向大道；西门西距西南城角 460 米，门道宽 13.7 米，长 25 米，路面发现有石块，门内保存有南北向路土百余米。西垣全长约 2274 米，曲折多弯，墙基宽一般在 20~30 米，在南段北头发现一座城门，门道宽约 20.5 米，长 33 米，门内南侧有一夯土基址与城墙相连。门道有两层路土，连以东西向大道。北垣长约 1404 米，呈直线，城门以西宽 20 米，城门以东宽 55 米。城门位于偏西处，东距东北城角 770 米，门道宽 10 米，长 86 米，外口两侧城墙向前凸出，护城河亦随之曲折；里口两侧有夯土基址与城墙相连，当是城门的附属建筑。门道连以南北向大道，与西垣城门所连大道相交接。其东垣和北垣外护城河宽约 25 米，南垣和西垣外护城河宽约 13 米。西垣偏北处有一排水道口，连以一号排水河道。发现有夯土建基址、手工作坊址等多处。整座城周长（只计其大城与小城临外部分）约 19000 米，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

通过解剖大城西垣南段与小城北垣衔接处发现，其墙基宽 40 米，深 3.5 米，夯层 4~6 厘米不等，夯窝清晰。大城西垣原夹在小城北垣之中，而且有通过小城北垣继续向南延伸的迹象，这表明大城的修筑年代是早于小城的。又根据小城城垣夯土打破周代文化

层，夯土中杂有灰土及战国时期陶片等推测，其修筑时间当在战国时期以后。而大城的修筑时间，经对北垣东段 200 米的城墙墙基进行清理解剖，已发现有西周、春秋及秦汉时期的夯土层，可判定始建于西周时期，当为太公所筑。原大城西垣南段当在小城北垣之南，而其南垣当通过小城东垣所在继续向西延伸，二者有可能在桓公台东南部相交，西南城角略呈钝角状。所谓一号排水河道很可能原为大城西南城角外的一段护城河，其在桓公台以东呈南北流向的一段与大城西垣基本在一条直线上，似可表明这一点。此河道原当继续向南延伸，与大城南垣外护城河向西延伸部分交汇；而在桓公台以北呈东西流向的河道当向西通于系水。在小城北垣城门路土下发现有夯土，门内与门外的路土下均压有文化堆积层，小城东垣附近冶铁作坊遗址下压有较早的文化堆积层等，亦可表明此小城东北部当为原大城西南隅。如此，原大城西垣当包括小城北垣以北 2812 米 及以南 至与大城南垣西向延伸线相交处约 1000 米 两部分长约 3800 米 南垣当包括小城东垣以东 2821 米 及以西 至与大城西垣南向延伸线相交处约 500 米 两部分长约 3300 米 连同大城北垣长 3316 米 东垣长 5209 米，则其周长当在 15600 米左右。其时，古营丘在大城西垣之外。

比照考古勘测图，原大城平面当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向略长，约为 4200 米（依东垣取直线计）；

东西向略短，约为 3300 米。其东垣、西垣虽有折曲，然基本上呈正南北走向；南垣平直，而走向略偏于西，约为西偏北 10° ；北垣东段亦平直，走向略偏于西，约为西偏北 15° 。城内街道多有折曲，而中部和东部两条南北向干道南段则基本平直，走向明显偏于西南，约为北偏东 10° ，与南垣近于垂直相交。由此而使整座城的面向略偏于西。为什么会作如此规制呢？《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所记齐景公与晏子等的问答道出了缘由。在新落成的“柏寝之室”（其柏通于伯，可训为大，柏寝即大寝，亦称路寝，为国君居寝之所，位于宫城内朝宫之北），师开为齐景公弹琴。他凭琴声判断“室夕”即居室的朝向偏西。景公召来主持修建居室的大匠询问。大匠解释说，因宫城的朝向偏西，为顺应其势，故作此规制。景公召来主管国家营造之事的司空询问，司空解释说，宫城朝向偏西，是为顺应外郭城之势。后晏子入朝，景公又问：“先君太公以营丘之封立城，曷为夕？”晏子解释说，营建都城应该朝向正南，依据日影和北极星来“辨方正位”，不会发生测量上的误差。而此城朝向偏西，原是太公有意为之。“周之建国，国之西方，以尊周也。”即因周王所居的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郊）位于西土，为了向周王表示尊重，故将齐国都城规划为朝向偏西。此“城夕”正与今考古勘测所揭示的大城形制相吻合（见图 2）。二者互为印证，可表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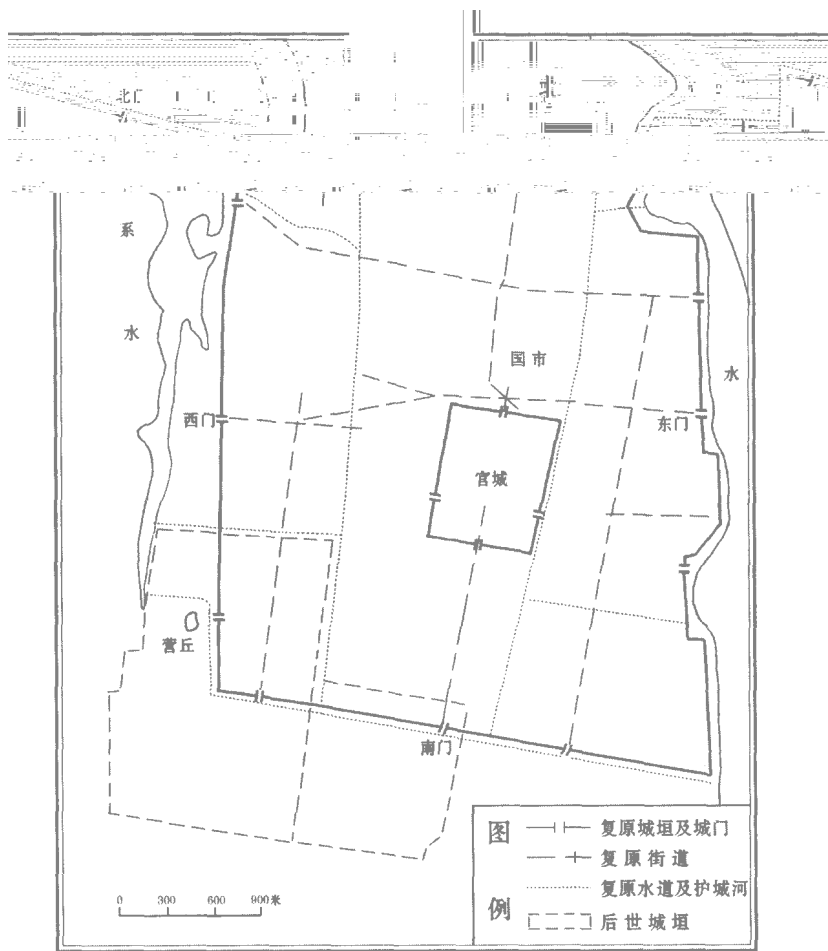


图 2 西周临淄城推测复原示意图

(底图据《临淄齐国故城钻探实测图》)